

索马里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部落问题

——以国家建构关系理论为视角*

韩志斌 邢 昊

内容提要 根据国家建构关系理论的观点,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国家建构就较为容易。索马里当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部落问题,使得部落与国家竞逐社会权力,造成“强社会”博弈“弱国家”的社会结构,缺失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机构。在前殖民时期,索马里部落社会属于分支-世系体系,这也是索马里部落问题生成的历史情境。殖民政府、索马里共和国、索马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国家建构过程中采取措施解决部落问题,但均未奏效,其原因在于索马里长期存在着以父系血缘为基准的部落政治,部落之间难以进行有效的政治对话。各个亚部落群体都以其父系传承为主要判断标准,进而导致部落与国家间的竞逐与博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话语。索马里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盟实体,遑论建构现代国家建立所需要的威权中央体系。要想完成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索马里部落宜从其内部的组织模式上寻找契机,进行内部改革。惟其如此,索马里才能打破传统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壁垒,寻找重构统一民族国家的新道路,发现国家建构的新路径。

关键词 索马里 国家建构 部落 国家建构关系理论

索马里在历史上被称为“印度湖畔的明珠”,但在国际政治视野中总是以“乱”为根本特征。提及索马里,总是与海盗、内战、恐怖组织等联系起来,是后冷战时代以国家分裂、次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暴力和暴力政治的国家之一。^①那么,索马里之乱与国家建构失败的深层根源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安德列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提出了“国家建构关系理论”,对解释此问题有所启示。其核心观点认为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国家建构就较为容易。^②具体到索马里个案,内外力量在索马里国家建构过程中未能支持和提升索马里中央政府的执行力和权威,难以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深层根源是强大的地方部落社会损害了脆弱政府的权威性,助长了腐败和其他非法活动。^③换言之,索马里当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部落问题,使得部落与国家竞逐社会权力,造成“强社会”博弈“弱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演进态势。在索马里等非洲国家,部落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特定历史情景的自然演变和理性选择。本文拟在国家建构关系理论框架之下,以索马里长期存在的部落体制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部落社会通史研究”(项目号:15ZDB062)以及陕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研究”(项目号:13JZ04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Catherine Besteman, “Violent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mali Nation-State”,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3, no. 3, August, 1996, p. 589.

② (瑞士)安德列亚斯·威默著,叶江译《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2页。

③ Ken Menkhaus, “State Failure, State-Building, and Prospects for A ‘Functional Failed State’ in Somal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56, November 2014, p. 154.

和部落问题生成情境为基础,梳理部落与国家建构的逻辑演化历程,探索如何在部落社会中重构索马里民族国家的基本路径。

一、分支-世系体系:索马里部落问题的生成情景

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力的索马里部落社会中,秩序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呢?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提出的分支-世系理论(segmentary lineage theory)对此作出经典回应。他认为,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下,部落联盟由数个不同部落构成,部落会分化出分支(segments),分支有世系(lineage)以及年龄组(age-set),这样的分分合合就构成了部落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运行规范。^①对于每一个分支部落的群体而言,其内部成员的身份和地位相对于外人而言具有一种不可分化的同质性。部落政治生活的核心是人,但绝不是所谓的民主政治,而是地缘政治,部落民依自己所居地的不同形成我者和他者之间的自然分化。

第一,索马里部落社会具有分支-世系的特点。索马里部落社会有一主体部落,并将部落的祖先追溯到往圣先贤。索马里的主体部落包括萨马莱(Samale)和萨布(Sab),二者是索马里国家同质化的基础。^②萨马莱部落是索马里民族的主体,是囊括包括萨布部落在内的统称。在历史传说中,二者是同宗兄弟,拥有共同的男性祖先。萨布族部落总人口不超过50万,属农耕部落,分布在朱巴河和谢贝利河之间。索马里还有人数较少的班图(Bantu)部落,约8万人,分布在谢贝利河和朱巴河两岸以及两河间的村庄里。分支部落再分为世系(lineage),有一共同男性祖先,追溯6—14代。规模小的分支部落易于管理,但难以独立做大,必须附属其他部落。^③萨马莱部落包括四个分支部落,即迪尔(Dir)、伊萨克(Isaq)、哈维耶(Hawiye)和达鲁德(Darod)。萨布部落包括两个分支部落,即迪吉尔(Digil)和拉汉文(Rahanweyn)。这些部落广泛地分布在索马里全境。

第二,索马里部落混居杂糅,内部矛盾重重,形成一种“对抗-平衡”的认同文化。各部落有固定领地,但也有混居现象。迪尔部落主要居住在索马里共和国西北部、吉布提共和国与埃塞俄比亚的东部地区。伊萨克部落主要居住在索马里共和国北部的中心区域。伊萨克部落和达鲁德部落的杜尔巴汉特(Dulbahante)、瓦尔桑格里(Warsangeli)分支部落混居在一起。达鲁德部落人口约150万,人口数量最多,地域分布最广,其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肯尼亚东北部,但其中插入了哈维耶部落、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哈维耶部落宣称有50万人,居住在穆杜格、希兰(Hiran)和摩加迪沙附近。哈维耶部落部分人口与萨布部落混居在一起。^④各部落之间常因利益问题爆发冲突,并且由于部落规模的增长和部落之间的频繁迁徙导致部落冲突逐年扩大。萨尔兹曼称之为“对抗-平衡理论”。^⑤这种不同分支-世系部落之间保持着一种对抗关系,成为索马里部落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文化认同,维持无序社会的有序运动,用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话就是“有序的无政府”。^⑥

第三,索马里部落的父系血缘原则进一步加剧了部落之间的冲突。索马里部落按照父系追溯血统,在这种复杂的部落社会内部从属关系中,最起约束作用的是“血亲复仇群体”(diya-paying group)。某一成员受到伤害,部落群体会向敌人报复或索取赔偿,群体的组织原则是按照部落父系的远近亲疏而形成的。父系家族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索马里人的政治和法律身份及其在部落

①⑥ (英)E. E. 埃文斯-普理查德著,褚建芳译《努尔人——对一个尼罗河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12、15页。

② Mohamed Haji Mukhta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The Scarecrow Press, 2003, p. 62.

③ Virginia Luling, "Come Back Somalia? Questioning A Collapsed Stat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8, no. 2, January 1997, p. 292.

④ (英)I. M. 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5—6页。

⑤ Philip Carl Salzman,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8, pp. 49—100.

社会体制中的具体地位。索马里部落父系家族政治模式的长期存在,导致索马里无法形成具有公信力的权威部落联盟。部落之间并不会因为政治或其他利益而进行有效的对话,各个亚部落群体都以其父系传承为主要判断标准,没有统一的政治话语,使得索马里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盟实体,进而无法形成建立现代国家所需的威权中央体系。即便是建立国家后,也不能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以部落对抗国家、部落和国家竞逐社会资源为特征的部落结构成为索马里政治-社会关系的常态,父系统治模式的单一性和离心倾向始终是索马里国家建构的最大障碍。

第四,索马里部落是典型的平等型部落,成为部落分权的重要因素。按照查尔斯·林霍尔姆(Charles Lindholm)的观点,这些国家的部落社会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贝都因部落和阿富汗普什图部落为代表的平等型部落。在平等主义的部落体系中,强调通过达成共识而非强制命令来维持内部秩序,处于统治地位的部落不会支配相邻的部落。一旦发生一个部落试图控制另一部落的情况,强烈的平等意识会促使其他部落出面主持公道,阻止这种控制。另一种是以中亚、土耳其和伊朗部落为代表的等级制部落。由于具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等级制部落社会内部秩序井然,冲突与矛盾较少。^①索马里部落具有平等型部落的典型特征:一是部落首领是苏丹,但其与伊斯兰国家首领的地位相差甚远;二是索马里部落社会没有权力等级制度,其惯常的决策程序是民主的,强调部落之间的平等。^②索马里北部的部落苏丹地位相当于长老,没有什么权力,只不过是一个称谓而已。索马里南方格勒迪(Geledi)部落的首领也没有随从和土地,部落成员达成共识是统治的基本方式。^③刘易斯对索马里部落的总结较为精辟:强烈的平等主义、政治上的机警与平均主义以及对部落传统的自豪感和对其他民族的轻蔑。^④

在分支-世系的部落体系中,索马里平等型的部落结构,父系血缘结构的部落认同模式导致部落社会呈现碎片化的结构特征,部落冲突逐年扩大,形成部落对抗中央权威的问题。如何整合部落力量、平衡部落间利益分配以及增强部落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成为解决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也是索马里国家建构失败与重构的根源所在。

二、整合与消解:外部力量对索马里部落问题解决的尝试

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索马里在前殖民社会便具有实现国家建构的潜质和前提。大约有400万人居住在非洲之角,其中索马里族占97%左右,他们拥有共同的语言(索马里语言)、共同的宗教(伊斯兰教,穆斯林人口占99%)、共同的文化。^⑤直到19世纪前半期,索马里依旧处于部落社会,尚未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缺少捍卫民族独立或者说为民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基础力量。父系血统下的部落社会制度致使索马里历史上长期处于“有部落,无国家”的社会状态,体现出分支-世系社会下分散性和碎片化的政治地理特征。这正是索马里在建构民族国家时的主要症结所在,即现代国家的整合与传统部落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和角逐。这也符合国家建构关系理论的观点,民族国家认同不是族群同质性的产物,而是由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提供所产生的。^⑥

索马里前殖民社会一直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公元7世

① (瑞士)托马斯·巴菲尔德著,杨张锋译《中亚视域下的部落与国家关系》,《中东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② Abdi Ismail Samatar, "Destruc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Somalia: Beyond the Tribal Conventio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0, no. 4, December, 1992, p. 626.

③ David Laitin and Said S. Samatar, *Somalia: Nation in Search of A St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7, pp. 42-43.

④ (英)I. M. 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14页。

⑤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编著《索马里·吉布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⑥ (瑞士)安德列亚斯·威默著,叶江译《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第1页。

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随着阿拉伯移民进入索马里,伊斯兰教随之传播开来。索马里部落社会接受伊斯兰宗教信仰后,伊斯兰主义便深刻影响着部落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元11—12世纪,阿拉伯沿海和内地出现了一些苏丹国家,最著名的是泽拉(Zeila)、摩加迪沙(Mogadishu)和米主提因(Mijerteyn)。到16世纪,索马里境内的苏丹国多达30个。15—16世纪,摩加迪沙苏丹国势力强大,控制着东非贸易,17世纪初开始衰落,先后受控于阿曼苏丹国和桑给巴尔苏丹国。18世纪初,索马里南部出现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阿居兰苏丹国(Ajuran),控制并吞并了周遭部落以及沿海地区,但很快昙花一现,走向崩溃。

索马里前殖民时期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原因在于:索马里境内苏丹国大多是在部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照分支—世系的逻辑时而结盟,时而对立。索马里苏丹国的统治者权力并不大,没有制定政治制度和建立权威政府的能力,核心政治机构是为了解决特定部落冲突而成立的专门理事会。部落民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有威望的男性长者主导议事程序。宗教人士受到游牧部落的特别尊重,原因在于其德行高尚以及因照顾病人和关心社会流民而博得的声望,与政治权威无关。苏丹和毛拉赢得支持是建立在个人魅力而非任何制度化的权力基础之上。^①

随后,索马里进入殖民时期。早在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就开始侵入“非洲之角”。这一时期的殖民者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例如掠夺黄金和象牙,从事奴隶贩卖等罪恶勾当。后来,索马里成为俄塞俄比亚、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逐鹿之地。19世纪后期,通过保护国、租借协议和军事征服,索马里被英国与意大利殖民政府分割管理,形成英属索马里与意属索马里两大区域。^②英国势力范围在亚丁湾沿岸,其余的由意大利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索马里南方一直处于英国军事管理之下。1949年,索马里南方复归意大利托管。

英国与意大利殖民时期,为解决部落问题,殖民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整合部落,进行现代化改革。

第一,殖民政府打破部落传统边界,建立州或“大区”,促进部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意属索马里被划分成7个州或“大区”,下设33个由驻扎官管辖的区。区划打破部落传统边界,规定新的地方政府必须包含不同部落。以上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部落社会,为索马里建立新的政治模式以及建构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第二,任用部落首领进行统治,试图削弱父系血缘部落制度的影响力。在索马里地区,部落首领大多都是名义上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父系血缘部落制度的继承人手中。英国殖民政府通过正式任命和发放薪水的方式,赋予这些人名义上的统治权。英属索马里的部落首领成为英国殖民官员和广大民众的联系纽带,有时还享有司法权,因为行政当局缺乏处理案件的能力。^③

第三,建立现代教育、交通、医疗体制,提高索马里地区社会服务能力。殖民统治期间,索马里公路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里程达到6400公里,进一步促进了部落之间交流与融合。在医疗方面,索马里主要城市相继建立医院,次级单位地区建立诊疗所。1933年,索马里成立第一所护士培训学校。这些医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索马里居民的死亡率。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52年,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和中学相继建立,索马里受教育人数逐年上升。以上现代社会体制的建立,提高了索马里部落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

第四,殖民政府官方支持索马里部落设立各种政治社团。1943年5月13日,索马里青年俱乐部在摩加迪沙成立。这个俱乐部有13个创始人,由索马里主要部落代表组成。索马里青年俱乐部

① David Laitin and Said S. Samatar, *Somalia: Nation in Search of A State*, pp. 57 - 58.

② Catherine Besteman, "Violent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mali Nation-State",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3, no. 3, Aug., 1996, pp. 580 - 581.

③ (瑞士)安德列亚斯·威默著,叶江译《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第112页。

成立的宗旨是消除部落冲突,宣传西方新的国家观念。俱乐部的做法得到英国军管当局的支持,建立不久便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1946年,俱乐部成员已经有2.5万人。1947年,俱乐部改名为索马里青年联盟。为了与之相对抗,意大利殖民政府资助成立了“索马里大会”。上述政治团体设立后,索马里部落争端和矛盾焦点从传统的以经济为主转向政治和建立现代国家。

第五,建立现代行政机构,实行部落民主化改革。由于索马里民众文化素质低下,英属索马里殖民官员大都来自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有学者认为还包括肯尼亚人。^①意属索马里的官员则来自意大利本土,如摩加迪沙总督任命意大利人为省区的首领。截至1956年,在意大利和英国殖民政府的帮助下,索马里地区建立了48个市议会,后者在行政和财政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不过,索马里本土人士在英属索马里政府机构的数量偏少,而在意属索马里的政府机关中较多。1958年,英属索马里政府机构有200名官员,索马里人仅占30人。1927年,意属索马里行政部门雇用了350名意大利人和1700名索马里人和阿拉伯人。^②在此阶段,部落民主化改革也取得长足的进步,传统的部落会议被民主选举代替,男性居民获得投票权,根深蒂固的父系血缘部落制度逐渐有所松动。

不可否认,意、英殖民政府对索马里部落的初步整合与改革取得一定成果,打破了部落社会封闭孤立的局面,部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程度加深,部落民主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作用也有局限性。索马里地区被称为“游牧民主”(Pastoral Democracy),即游牧主义和民主文化杂糅交错,实际上是一个无国家社会。^③殖民统治对部落社会结构影响甚微,殖民政府没有向部落民众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也无法改变部落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状。索马里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游牧部落,在有道德威望的部落首领、没有权力等级的苏丹以及宗教权威的领导下,通过分支-世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其长期发展的历史逻辑就是国家机构缺位,部落问题的固化。

三、部落角逐国家:索马里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后果

1960年6月26日,英属索马里实现了完全独立。1960年7月1日,意属索马里兰独立。即日,两地合并成立索马里共和国。至此,索马里开始从内部进行国家功能性的制度建设与政治机构的创设。1969年10月15日,索马里共和国舍马克总统遇刺身亡。同月,由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领导的军官发动政变,成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1970年10月,索马里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1989年,索马里内战全面爆发。1990年12月30日,以索马里第二大部落哈威耶为基础的“索马里联合大会”部落武装率先攻入首都摩加迪沙。1991年1月,西亚德率部逃往索马里南部部落基地,结束了对索马里长达21年的统治。至今,索马里依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部落成为解决索马里国家建构困境的关键所在。

索马里共和国和索马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解决部落问题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索马里共和国制定统一法典,鼓励成立全国性政党。统一的法律使得索马里政府更加权威化,并且在法律层面削弱了部落传统习惯法和伊斯兰宗教法律的影响力。为了压制部落世系基础上的政党,索马里政府采取新的选举规则,进一步平衡各部落在选举利益上的分配。

第二,索马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削弱部落力量。一是打破部落界限,全国分为18个州,87个区。二是重新命名的州不再使用部落名字,如西亚德政府将米朱提尼(

^① Ioan M. Lewis, *A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a: Nation and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 p. 115; David Laitin and Said S. Samatar, *Somalia: Nation in Search of A State*, p. 106.

^② (瑞士)安德列亚斯·威默著,叶江译《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第113页。

^③ Abdi Ismail Samatar, "Destruc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Somalia: Beyond the Tribal Conventio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0, no. 4, Dec., 1992, p. 627.

Mijerteinia 部落名) 州更名为巴里州。三是为了削弱部落首领的权力,索马里政府在州、区和村派驻军事行政人员,行政部门的官员都由军人代替。

第三,通过立法削弱人们的部落观念和部落势力,确立科学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索马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临时议会通过议案,规定不许用部落名称命名政党。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调查和研究如何使传统的部落关系适应现代国家的政治需要。1970年11月,索马里政府颁布法令,取消所有部落头衔和特权,禁止部落拥有土地、牧场和水源,禁止宣传部落主义。1977年4月,索马里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反对和批判部落主义运动。掌权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十分注意团结不同部落人员,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部落观念有所削弱。^①索马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明确社会主义是统一部落分散力量的正确选择。政府宣传口号是“部落主义是分裂的源头,社会主义是团结的保障。”^②西亚德政府主张使用“同志”来取代传统的“兄弟”称谓。“兄弟”一词带有部落主义、血缘关系的内涵,“同志”一词体现了索马里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友谊和普遍关系,可以让索马里从根本上不再有传统的分化力量。此外,西亚德政府以巨额罚金、监禁和死刑的方式替代传统意义上的部落血偿制度。

第四,个人崇拜代替父系部落崇拜,降低部落依附感。索马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强政治动员,让民众形成一种全新的革命热情,鼓动对国家元首的个人崇拜。索马里官方出版西亚德总统的传记,称其为“战无不胜的领袖”。^③随后,索马里的海报、小册子等在全国宣传西亚德总统的丰功伟绩。个人崇拜在整个索马里国家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认同氛围,降低了民众对部落的热情,索马里世代相传的部落效忠有所弱化。

第五,用罗马字母作为索马里语言的官方书写形式。1972年,索马里政府决定以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的一套字母作为索马里语的文字。索马里语成了有文字的国语,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是不多见的。1973年和1975年,西亚德政府在农村开展扫盲运动,降低农村的文盲率,传统的部落文化受到现代教育的巨大挑战。统一的文字书写使得国家政策和命令得以快速推行。

尽管如此,索马里共和国和索马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相继落幕。追根溯源,索马里国家建构的失败在于部落对抗国家成为政治常态。

第一,殖民遗产给索马里带来的只是脆弱的现代国家,以部落为纽带的政治关系始终掣肘着索马里共和国的国家建构。欧洲著名人类学家恩里科·塞鲁利(Enrico Cerulli)和I. M. 刘易斯曾经指出,要了解索马里政治,就必须了解索马里的部落宗族和亲属关系,索马里问题的关键就藏在部落体制之中。^④尽管索马里共和国成立了,但索马里仍然是一个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脆弱国家。索马里政府的政治稳定性始终取决于政治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平衡众多部落之间的竞争和敌对关系,解决部落问题。部落的长期存在导致地方政治盘根错节,使得国家在建立统一中央政府时困难重重。索马里实力雄厚的部落比政府更有威望,部落武装成为威胁索马里国家建构的力量。因此,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必须建立在部落体制与国家的相对平衡之上,任何一方的倾斜都会使国家陷入混乱与冲突。如何在部落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建构,进而建立民族国家,成为索马里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第二,部落认同强于国家认同。由于英属和意属索马里两大托管地的合并以及国家独立时间短暂,索马里部落的政治地位和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人们面临着对部落和国家忠诚的两

①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编著《索马里·吉布提》第73页。

② Mary Harper, *Getting Somalia Wrong? Faith, War, and Hope in A Shattered State*, London: Zed Books, 2012, p. 54.

③ (英)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192页。

④ Abdi Ismail Samatar, "Destruc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Somalia: Beyond the Tribal Conventio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0, no. 4 Dec., 1992, p. 638.

难选择。例如,作为全国性的政党组织,索马里青年联盟成员是不同部落的联合体。因此,联盟成员便面临着认同国家或认同部落的两难。特别是当国家利益和部落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支持后者。另一方面,人们对部落的归属感和忠诚,使得以部落为纽带的联系更为可靠,因为这种纽带甚至可以在某一部落中的游牧民与政府中的公职人员或国民议会、内阁成员之间建立一种亲密联系,部落政治也因此索马里国家中依然存在。

第三,索马里在成立之前没有进行民族国家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洗礼,部落作为部落体制运转的媒介未进行充分的现代化改革,未与现代国家政治模式进行平衡与融合。正如阿卜杜勒·奥马尔·曼苏尔(Abdalle Omar Mansur) 所说“当今索马里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格格不入。”^①由部落为纽带形成的政治联系是索马里难以建成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的最大障碍,这也是索马里国家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为了平衡国家内部的特殊政治利益集团,1961年7月,舍马克总统宣布新政府由索马里青年联盟、索马里统一党和索马里民族联盟联合组成。但是,各个政党联盟中部落势力依旧存在,有影响力的议会代表依旧来自当时的主要部落。这些部落首领以全新的方式参与政治来维护部落利益。由于部落基础和政治立场不同,迪尔部落与达鲁德部落组成的索马里统一党就成了由哈维耶部落组成的索马里民族联盟的反对者之一。这种政治组合和结盟,将部落分化合并成一个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政治联盟,并没有消除索马里因部落林立所形成的分裂势力,与建立统一集权政府的期许渐行渐远。

第四,国家领袖浓厚的部落情结也是索马里国家建构失败的深层原因。索马里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西亚德出生于索马里达鲁德部落中的马列汉部落分支。西亚德部落情结十分浓厚,推崇达鲁德部落主义。由于父亲被伊萨克部落所杀,因此他怀着部落复仇意识处理部落问题。^②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部落反对派,西亚德使用本部落的人担任政府要职,建立马列汉小部落和西亚德家族的统治。索马里人批判西亚德在反对部落主义时使用双重标准,索马里曾流行这样一个笑话,“政府在将象征部落主义的木像烧毁后,西亚德又在半夜将其挖出来重新放到自己的办公室。”^③西亚德总统采用回归部落主义、分而治之的方式对付部落问题的做法并不奏效,部落主义在索马里沉渣泛起,一些以部落为基础的武装力量相继出现。^④20世纪80年代中期,索马里已经显示出失败国家的迹象。除安全部门外,索马里政府机构开始减少,也不发挥什么作用,部落冲突频繁发生,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国有农场和国有公司大规模破产。

第五,索马里部落社会与政党政治交互缠结,产生了恶劣后果。部落的分支-世系所固有的排他观念,使得索马里各部落都以政党的名义在国家权力的争夺中大显身手。各部落都想让自己政党在政治角逐中一统江山、独步天下,索马里陷入“一国多主”的“战国时代”。^⑤部落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独立性和排他性。这种独立性在索马里部落林立的前提下,导致国家经常陷入混乱和分裂的局面。1981年以来,从索马里北部到南部地区,伊萨克、哈维耶、迪吉尔及达鲁德部落纷纷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党和武装力量,开展反政府的武装斗争。部落政党化的后果则是索马里党派林立,以部落利益为限的政治角逐成为常态,索马里国内陷入内战深渊而难以自拔。部落利益和国家利益深度融合,国家公权力成为部落谋求利益的工具。至今,索马里依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

① Virginia Luling, “Come Back Somalia? Questioning a Collapsed State”, p. 289.

② 葛公尚《索马里部族混战透析——兼论泛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部落主义对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载《世界民族》1996年第4期。

③ Raphael Cjijioke Njoku, *The History of Somalia*,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13, p. 125.

④ Ken Menkhau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in Somalia: Spoilers, State Buil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Cop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3, Winter, 2006/2007, p. 80.

⑤ Virginia Luling, “Come Back Somalia? Questioning a Collapsed State”, p. 288.

府、部落作为地方分裂势力存在的最大载体,成为解决索马里国家建构困境的关键所在。

四、结 论

按照国家建构关系理论的观点,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是指公民和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互动问题,是通过国家和公民之间建立环绕交换关系的政治整合的包容过程,以及国家层面的民族和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①由部落为纽带所形成的政治联系是索马里国家难以形成民众提供公共物品的统一政府的最大障碍之一,进而造成部落与国家博弈、竞逐与社会资源,这也是造成索马里国家建构困境的根源。英国、意大利殖民政府、索马里共和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都力图通过各种方式解决或弱化部落力量,解决部落问题,完成国家建构的任务,最终难逃部落内战的窠臼。由于父系血统下的索马里分支-世系部落社会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如果不能从部落内部进行改变,外部力量很难将其改造成现代国家行政体制。长期以来,联合国、非盟以及国际援助都未能改变索马里的混乱局面。若想解决索马里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部落问题,需要从其部落组织结构中寻找契机,从部落内部寻求变革,寻找适应国家建构的有利因素,消弭部落与国家竞逐与博弈的潜在可能性。只有这样,索马里才能打破传统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壁垒,找到重构统一民族国家的新路径。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theory of nation-building, it is easier to build a state, if the state can provide public goods. Tribal issues in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Somalia have made tribes and the state compete for social power, resulting in a social structure in which a “strong society” competes with a “weak state”, and the absence of a state institution that can provide public goods.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the Somali tribal society was based on a branch-lineage system, which w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 Somali tribal issues came into being. Although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Somali Republic and the Somali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have all taken measures to solve trib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state-building, none of them has worked. The reason is that tribal politics based on patrilineal consanguinity has been in existence in Somalia for a long time, which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conduct effective political dialogs among tribes. Each sub-tribal group takes its own patrilineal inheritance as the main criterion for judgment, which leads to the competition and game between tribes and the state, and the failure to form a unified political discourse. Somalia cannot form an effective union entity, let alone building an authoritarian central system that a modern state requires. To complete the historic task of nation-building, Somali tribes should look for opportunities from their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arry out internal reform. Only in this way can Somalia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between traditions and a modern state, and find a new approach to build a unified modern nation-state.

(韩志斌 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邢昊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生,西安,710069)

(责任编辑:于红)

^① (瑞士)安德列亚斯·威默著,叶江译《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第2页。